

请讲

“专车”是地方提升治理能力的试金石



▲顾大松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

最近,关于专车的争议甚嚣尘上,即使交通运输部1月8日肯定了“专车”的合法性,但仍有地方全盘否定“专车”。为何如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该类城市对于互联网专车早期雏形“商务车”的历史没有厘清,二是对交通运输部16号令生效以后如何开展预约出租汽车许可有误解。

最早的“专车”应是“商务车”,是汽车租赁企业在市场中发现并培养的产品,其中江苏苏州最典型。本世纪初,苏州经济迅速发展,外企多,机场接送业务量大,而企业自有车辆承担该类事务成本高,苏州市汽车租赁公司就发现了这个市场,并通过整合汽车租赁与代驾,形成了商务车产品。2006年,苏州市运管处宣布放开汽车租赁市场,推动了商务车业务在苏州的长足发展。

有商务车历史的城市,往往对网络时代的商务车升级版——互联网专车,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不论是苏州还是江苏省交通主管部门,一直认可商务车“租赁公司+代驾公司”的模式。如去年11月19日,南京市交通局就在回应“卸载打车软件”风波时,对互联网专车没有一禁了之,而是创新性地指出:“召车软件

信息服务商应当遵守现行法律法规,根据法定条件,对申请信息服务的车辆进行验证,为合法营运者提供信息服务,并加强自律和日常监管。”这就肯定了互联网专车的地位,是行政许可法放松管制精神在汽车租赁市场上的反映,也是在深化改革的今天,政府坚持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处理城市难题的具体体现,体现了地方政府的法治定力。

此外,某些城市以体制内“专车”否定体制外“专车”,系对交通运输部16号令生效后如何开展预约出租汽车许可的误解所致。

2014年9月30日颁布,2015年1月1日生效的《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部2014年第16号令)中,增加了区别于传统出租汽车的预约出租汽车许可。根据16号令规定,预约出租汽车与传统出租汽车的差别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在规定地点待客,提供预约服务,不能提供巡游揽客服务;二是服务费用可以约定,而非只能由政府定价;三是车身颜色与标识可以区别于巡游出租汽车,即可以不设顶灯,不用统一喷涂车身颜色。目前的“专车”,与16号令中预约出租汽车的主要特征基本一致,因此,可以将“专车”称为“体制外的预约出租汽车”,而预约出租汽车又可称为“体制内的专车”。

那么问题来了,体制外的专车是否因为体制内的专车而失去合法性?广州市交委将互联网专车称为“私租车”予以禁止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因为16号令的生效,体制外的预约出租汽车就违法了吗?或者城市实施了预约出租汽车许可,就要取缔市场上早已存在的“专车”或商务车呢?

笔者认为,这是僵化理解16号令设定预约出租汽车许可本义所致的错误认识。第一,16号令属于部门规章,对于各地方城市具有指导意义而非强制意义。它设定的预约出

租汽车许可是一种指导意义的政策供给,而城市交通又具有地方性,因此只有地方性法规设定预约出租汽车许可,才具有对体制外预约出租汽车的禁止意义。目前,禁止“专车”或“私租车”的城市并未通过地方性法规设定解除禁止意义的预约出租汽车许可,因此,禁止并处罚“专车”的法理根据不足。

第二,网络时代的“专车”属于市场创新的产物,符合行政许可法放松管制精神,应当予以鼓励并支持其发展。2004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规定,如果拟设置的行政许可事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或者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也就是说,地方性法规要通过设定预约出租汽车许可的方式禁止体制外的预约出租汽车(商务车与专车),必须是市场机制与行业自律机制,或者行政机关通过事后监督方式不能解决情况下的选择。

目前,推出互联网专车的企业,纷纷主动发布创新性的保险产品,自定车辆准入与驾驶员准入条件,服务质量标准等,以市场的方式回应社会公众与主管部门的安全和服务担心。也就是说,地方性法规没必要急于进行预约出租汽车许可立法,禁止市场上已有的创新。

因此,查禁“专车”的城市,应当厘清互联网专车作为网络时代升级版商务车的来龙去脉,把握好行政许可法的放松管制精神,坚持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大力引导推出专车产品企业的自我监管与行业自律,才能在守住法治底线的基础上,实现专车争议的合作治理,进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通则不痛

在每个市场主体都急切寻找用户“痛点”的互联网时代,政府部门也没闲着。这不,2015年的新政策也开始为我国居民的“痛点”出药方了。中医有云:“通则不痛”,这药方就是“互联互通”。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处方药网上卖谁给开

还记得2014年5月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起草的《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吗?

“互联网药品经营者应当按照药品分类管理规定的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这一表达,试图把网络销售处方药的禁区撕开一道口子,也试图解决“以药养医”的顽疾。

2015年,这一办法已呼之欲出。互联网与处方药市场的打通,让未来图景可以想象:人们购买处方药时,不用再到医院排队等候,只需要点击鼠标或动动手指,药就可以送到家中。

只是,处方药毕竟不是普通商品。监管能否及时,有力和到位,配送体系能否尽快完善,

公交一卡通全国谁来管

就在有些地方政府还为一城一地的交通问题犯难之时,交通部已经酝酿出了“大交通”计划。

日前,交通运输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正式出台。“促进各种交通运输方式融合发展”、“加快形成跨区域物流大通道”等提法,看得直叫人热血沸腾。

现实问题倒逼改革。我国交通运输的投融资体制,行政执法,收费公路发展等问题,都已显棘手和紧迫,也已到了不改就难以以为继的程度。也因此,相关调研组才遍访全国,收集意见建议,并最终提出系统性的改革措施。

意见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实现ETC、公共交通一卡通等全国联网”。当大数据与大交通走在了一起,频繁出差的人们在各地办的公交卡或ETC卡,仿佛可以寿终正寝了。但问题也来了,如果全国一卡便通了,那这张卡归谁管?

养老金并轨破冰谁补差

存在多年的养老金双轨制,终于被打破了。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宣告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正式破冰,近4000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告别“免缴费”时代。

多年来,养老金“双轨制”所带来的不公平,一直备受人们诟病。因此,近年来破除双轨制的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不过,宣布双轨制破除之日,还远不是养老金真正并轨之时。改革的钱从哪里来?城镇企业职工能否切实享受职业年金制度?会不会引发提前退休潮等问题,仍待后续改革措施的跟进。

无法回避的是,我国正走向老龄化社会。在养老金并轨之外,如何利用顶层设计,制定出一个真正能够应对未来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金制度,依然是一个考验。

预见

且慢

于幼军为何又成了新闻



▲于幼军

本报深度记者 龚海

当人们习惯每天等着中纪委网站发布官员动态时,眼尖的人从国务院任免决定中也发现了新闻。

14日,总计21人的工作变动被国务院一次性通报,而媒体单单挑出于幼军说事。62岁的于幼军从2011年初出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至今已四个年头,被免职这天,他正在河南南阳开2015年南水北调工作会议。

四年来,于幼军低调做事,不在媒体上露脸,但一举一动依然抢眼。

实际上,他已在南水北调办超期服役近两年。于幼军曾自称,“做一天和尚,撞好一天钟,别漏这个‘好’字。”如今南水北调中线已通水,他也是时候退下来过平静生活了。不过至18日晚,他的名字还未从南水北调办网站的领导专区隐去。

如此备受关注,大概是因为

这个曾经的政治明星几度起落,至今能从他身上揣摩中国官场的规则。

1953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丰县,于幼军,第一学历并不高,1980年至1985年在华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通过函授学习才拿到本科文凭,但他并非不学无术,30岁出头就与原广州日报社社长黎元江合作撰写了《社会主义四百年》,别出心裁地运用章回小说的形式,赢得年轻读者的欢迎,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这让于幼军一举成名,很快由广州社科所调任广州市委宣传部。

由学界转入政界后,于幼军41岁成为广东省委常委,在深圳干过市长,在湖南当过副书记、副省长,在山西当过省长,最后任文化部副部长。有思路,有想法,敢作为,他务实开明的作风一度被中央和媒体称许。

正准备大干一场,却突来晴天霹雳。2008年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并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于幼军自此沉寂,直到两年留党察看期满,他低调复出,任南水北调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很多人以为他会在此等东山再起,因为孟学农就曾因“非典”辞去北京市长后,短暂出任南水北调办副主任,继而赴山西任省长。

已经57岁的于幼军那时干劲十足,但始终没迈出位于玉潭潭南路的南水北调办大楼。现在,他的政治生涯谢幕,这四年没带来惊喜,长期跟踪他浮沉的媒体似

乎可以取消关注了。

有人唏嘘,当年于幼军到底犯了什么事,错误有多大,但那时没说,现在依然含糊不清。然而他能复出并平稳着陆,至少可以说,于幼军的问题确实非一般小问题,但又并非个人品质恶劣,贪污腐化之类不可救药,所以组织上仍愿意给予将功补过的机会。但话说回来,做官尤其要保持做人的基本节操,否则意气风发如斯,却落得这般光景。

这也让人联想到近日悄然在学术会议上露面的衣俊卿,他们终究与一般政客不同,还是文化人。就像于幼军谈到退休后的生活时对媒体说的,“肯定要回到书房去,读书、写书,最好还能教教书,回到人生的原点,我本来就是一个老师嘛!”

回到原点,近几年,于幼军就一直坚持读书写作,他的责任感和历史感是现任官员中少有的。2013年底,于幼军《求索民主政治》一书出版,延续一贯的严肃主题,全书以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了他对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得失的看法,触碰的大多是当下的敏感话题。能趟过一个“雷区”,获得正式出版,可见作者的思想理论功底和政治勇气与智慧。

书中谈的,是一般媒体不曾有机会发声的,而以于幼军的过往政治经验来反思共产党和这个国家走过的路,无疑还会增添不少睿智。如何走好民主政治这一关,于幼军透露他还未停止求索,正在写《社会主义五百年》第四卷,从1965年到1978年三中全会。